

改革开放40年民族经济学的发展

黄健英 于亚男

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民族经济学是由中国人提出并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学科。民族经济学研究始终围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服务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文章按照改革开放的进程把民族经济学研究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经济学初创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经济学研究深化阶段;2000年到2012年的民族经济学研究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以后的民族经济学研究的新机遇。文章分析不同时期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理论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通过民族经济学研究主题和内容的变化,认识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轨迹、特点和成就。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 民族经济学 中国特色 发展

作者黄健英,女,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于亚男,女,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民族经济学的创建,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各民族及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以及改革开放进程中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重点研究基于民族和区域特点的经济发展问题,是由中国人提出并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学科。经过40年的发展,民族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水平逐步提高,研究内容越来越多元,人才培养规模和层次不断提高,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20世纪80年代:民族经济学初创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施正一教授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民族经济学人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在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提出并创建了民族经济学,在建立研究机构、学科基础理论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这一时期的民族经济学研究得到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等相关部门和高校的大力支持,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两者成为当时全国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和“平台”,并在其带动下,凝聚和动员全国民族经济研究力量,开展民族地区经济调查和学术研究。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成立以来召开的年会主要议题可以看出,民族经济研究始终围绕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主题进行学术研究,如1982年会

议(昆明)的主题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1983年会议(银川)的主题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革理论问题”,1986年会议(北京)的主题是“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问题”,1987年会议(南宁)的主题是“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这一时期,民族经济学的重点是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等。

民族经济学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强调要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出发,因地制宜,关照地区和民族特点,在价格体制、投资体制、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等方面实行更加灵活的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有研究发现一些不适合民族地区的实际,因此提出民族地区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是跨越全国统一模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造一种既与其传统经营组织相适应又能促进其生产力发展的微观经济体制。^① 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伴相生的,改革就是从逐步开放市场调节的范围,发展商品经济开始的。民族经济学研究者对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和加快商品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除了分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特点和影响因素外,还积极探索加快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途径,较有代表性的如李甫春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及其发表的系列论文。^② 大部分研究认为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经济结构、非经济因素等是制约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从转变经营方式、观念变革、建设社会服务网络等方面为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条件。^③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围绕这一总体战略目标,民族经济学研究把“国情”和“区情”结合起来,认为民族地区的区情就是“民族性”“地域性”“落后性”“复杂性”和“国际性”,^④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在考虑本地区的区情的同时,要依据国家的总体战略,不是孤立的。^⑤ 民族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在于“具备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与其它经济发展要素结合所必需的经济技术能力,而提高经济技术能力,第一步在于出卖自然资源和以高利润率吸引技术和资金;第二步在于加强智力开发,提高人的素质,解决人才问题”。^⑥ 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和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二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一部专门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论文集,收录了于光远、刘三源、施正一等人的13篇论文,包括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整体研究和民族八省区的专题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两步走”战略,加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民族经济发展战

① 参见郭家骥:《论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科学·经济·社会》1989年第6期。

② 参见李甫春:《发展商品生产是繁荣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途径》,《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李甫春:《努力克服少数民族中制约商品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改革与战略》1985年第1期;李甫春:《努力建设民族经济中心》,《广西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李甫春:《旧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根源追溯》,《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③ 参见施正一:《少数民族地区更要加快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进程——〈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学习体会》,《中国民族》1985年第1期;龙远蔚:《民族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障碍问题》,《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

④ 参见施正一:《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必须正确认识共同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⑤ 参见于光远:《要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经济问题探索》1983年第9期。

⑥ 王文长:《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及突破口》,《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

略研究与缩小差距相结合,在对当时的“两步论”“梯度论”“跳跃论”“协同论”等区域经济战略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加速战略”。^① 围绕“加速战略”,曹征海和马飏对“加速战略”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和论证。^② 在研究发展战略的同时,民族经济学研究关注了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不仅需要进行经济结构和模式的分析与选择,确立经济发展的整体观念;同时也需要保持与自然界的对话,在人、社会、自然之间建立互相信赖的关系”。^③ 民族经济学研究把西部开发作为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一些年轻学者组建成立了“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并组织力量开展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调查和研究,发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论著,^④同时提出创建“西部理论”。^⑤ 施正一主编的《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研究》(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结合“七五”计划中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研究。一些学者讨论了基于民族地区地处内陆沿边的区位特点,提出针对国内国外开放的“双向大循环”理论;通过对东西部经济关系的讨论,分析了“外嵌入型”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输血”与“造血”的关系等。^⑥

民族经济学者还积极参与国内学术交流,并就一些问题展开学术争鸣,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如“梯度理论”和“反梯度理论”之争。针对何钟秀、夏禹龙等人提出的国内技术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的“梯度推移规律”,^⑦内蒙古的几位年轻学者提出“反梯度理论”与之进行讨论,认为不发达地区可以依靠其丰富的资源,从国际上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不一定遵循“梯度推移规律”。^⑧

在紧密结合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展开应用研究的同时,学科创建之初,学界围绕学科称谓和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展开讨论。关于学科称谓主要有“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民族地区经济”和“民族发展经济学”四种提法。施正一在主张“民族经济学”提法的同时,把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广义”和“狭义”,认为“狭义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并指出,“民族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⑨ 坚持“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提法的观点认为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结构和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依据,以便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⑩ “民族发展经济学”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相交叉的新学科,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产生的,这门学科对各民族经济生活作历史的和现时的考察分析,揭示各族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产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发展模式等”,^⑪

① 参见施正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中国民族》1986年第11期。

② 参见曹征海、马飏:《起飞前的战略构想》,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③ 王文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结构·模式·未来》,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④ 参见罗康隆、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⑤ 参见郭凡生、朱建芝:《西部开发与“西部理论”》,《科学管理研究》1985年第6期。

⑥ 参见潘照东:《从三重错位走向协调发展——论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的选择》,《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⑦ 参见何钟秀:《论国内技术的梯度转递》,《科学管理》1983年第1期;夏禹龙:《梯度理论与区域经济》,《科学学》1983年第2期。

⑧ 参见郭凡生、潘照东、曹征海:《摆脱贫困的思考》,技术经济导报社1986年版。

⑨ 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3页。

⑩ 黄万纶:《论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⑪ 高言弘、费怀信:《论建立民族发展经济学》,《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并指出“研究我国的民族经济,应以民族地区为主体来进行”。^①

上述三种提法虽然存在差别,但又有很大的一致性,都认为民族经济学是交叉学科,研究任务或重点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于光远认为,“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很接近、关系很密切的,但又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指出“少数民族经济属于民族经济的范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属于地区经济的范畴”。^②学者在之后的研究中并没有严格进行这种区分,大部分“民族经济学”或“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都把重点放在“民族地区经济”研究层面上,或者说是民族与区域的结合研究上。对此,王文长认为,民族经济、少数民族经济、民族地区经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对民族结构和区域状态的限定在相互间划开了界限。三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经济的存在形式既离不开具体人的行为,也离不开具体空间状态,民族经济必然通过具体民族的具体活动区域去落实、表现;少数民族经济必然反映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中;同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也必然容纳着少数民族经济。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这三个不同概念被简化、相似或等同的混用现象,把少数民族经济甚至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简略为民族经济或民族地区经济”。^③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民族学家杨堃教授在民族经济学创建之初就提出了西方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他在介绍西方“经济民族学”(经济人类学)的同时,认为其“是一门介乎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并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它学科性质是属于经济民族学的”。^④

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的组织动员下,这一时期民族经济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学界的交流和合作十分密切,每年的年会都有上百人参加。施正一教授主持的国家“七五”(1986—1990)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于1986年底立项,1987年开始调查研究和写作,课题包括3个主课题、29个分课题、10个专题研究报告,出版专著22本(有些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该课题的实施,不仅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成果,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⑤其中施正一主编的《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研究》(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曹正海、马飙的《起飞前的战略构想》(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李竹青的《西藏经济的发展与对策》(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获得很高评价,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民族经济学科创建之初,就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是第一本民族经济学的专业教材。该书1979年开始筹划编写,1981年完成后以内部教材的形式使用,1985年修订出版,初步形成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体系,并对其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和规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和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一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收录了于光远、施正一、黄万纶、石争、董子健、杨敦品、李家秀等学者撰写的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客观依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等方面的论文,对当时学科发展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施正一的《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包括其在

① 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1990年版,第5页。

② 参见于光远:《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③ 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④ 杨堃:《论拉法格对民族学与经济民族学的贡献》,《思想战线》1985年第1期。

⑤ 参见龙远蔚:《民族经济研究30年概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979—1986年间撰写的11篇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和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的论文,是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重要著作。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和延边大学分别于1982年和1984年开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民族经济学的创建得到于光远、牙含章、杨堃等老一代经济学家、民族学家的大力支持,学科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和研究骨干有施正一、黄万纶、董子健、石争、巴音蒙和、费怀信、徐敬君、潘文、张克武、李文潮、李竹青、白振声、那日、况浩林、杨荆楚、赵素琴、张继涛、李甫春等,^①他们为民族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还涌现出一批年轻学者,如王文长、龙远蔚、马飏、谭明华、郭凡生、潘照东、曹征海、张协堂、赖存理、田广等,发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论著,是当时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年轻力量。

二、20世纪90年代:民族经济学研究深化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族经济学研究在80年代的基础上,学科研究体系和框架初步形成,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规模扩大,研究队伍更加稳定。这一时期的研究队伍仍以80年代从事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为骨干。同时随着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以高校为代表的较为稳定的学术队伍。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南民族大学于1991年开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中央民族大学于1994年开始培养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虽然在学科称谓上仍有“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民族地区经济”等不同提法,研究体系和内容上有所差异,但研究的核心还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具有显著的问题取向。在继续研究和关注“差距”问题的同时,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生态问题等成为研究的热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组织了不同规模的学术活动,但其组织动员全国性学术研究的能力和影响力较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

差距问题仍是这一时期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主要的研究模式是用数据比较分析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分析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原因,探讨缩小发展差距的可能性,以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同时认为长期的非均衡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边疆稳定。^②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段时间有关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研究的论著主要探讨了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市场经济的培育及机制的完善、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挑战与机遇等方面,初步勾画了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建设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③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随后中国政府编制了《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3月25日),首次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此后,民族经济学研究主要讨论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特点、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等,并开创性地提出生态环境的“利益补

^① 参见施正一主编:《民族经济学教程(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②③} 参见龙远蔚:《民族经济研究30年概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偿机制”问题。^① 随着边境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国家沿边开放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对外开放和边境贸易的研究日渐丰富,在总结边境贸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对策思考。^②

20 世纪 90 年代是出版以“民族经济学”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为书名的论著较多的时期,甚至超过 21 世纪前十年。这些论著虽然出版于 90 年代,但很多是 80 年代研究的延续,著作者大部分也是第一代民族经济学研究者。这些著作在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方法和内容等方面既有共同的方面,也有各自的特点和研究体系。其中有些是对原有研究的补充和完善,有些力图建立新的研究体系。较有代表性的有高言弘主编的《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童浩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鄂西民族经济编辑部编的《民族经济学》(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0 年版),施正一著的《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及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陈虹、哈经雄主编的《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库·少数民族经济卷》(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 年版),陈庆德著的《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黄万纶、李文潮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教程》(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李竹青、那日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新编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当代中国经济大辞库·少数民族经济卷》是 80 年代研究的集大成,全书 200 万字,近 50 人参与撰写,内容全面、资料丰富,是对民族经济的全面系统研究。1990—1999 年间,讨论民族经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方面的论文近 20 篇。如贾晔的《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管见》(《广西民族研究》1992 年第 1 期)、陈庆德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 年第 1 期)、龙远蔚的《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民族研究》1998 年第 5 期)、王燕祥的《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 年第 3 期)、王文长的《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99 年第 4 期)等。

上述论著的共同点是对学科研究意义和必要性的肯定,同时对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研究思路和体系。其中,陈庆德有关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学科关系、研究内容的观点不同于其他研究,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关注和讨论。陈庆德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重点,将聚焦于工业化后民族的经济 development 问题”,同时认为“民族经济学是经济人类学与发展经济学联姻的产物”。在谈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他认为:“民族经济学以各民族经济体在全球结构中的平等地位与全面发展为出发点,把物量指标、民族文化的特征以及社会目标的选择集于一体。”^③民族经济学“对延续于不同文化条件下的经济过程和制度变革进行描述、解释和发展论证,以实现在同一发展进程中的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平等进步为己任”,“必须在人类学与经济学的直接联合中进行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并实现对这两个古老科学的超越,探索民族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④ 在其后来的研究中,更多地借鉴和运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创了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就民族经济学创建的背景和研究体系而言,虽然借鉴了经济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有共同的地方,但显然与西方相关学科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也不是直接的“联姻”或“联合”。民

① 参见洛桑·灵智多杰主编:《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年版,287—288 页。

② 参见张克武、周严:《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民族研究》1996 年第 1 期;李玉虹:《边境贸易是沿边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途径》,《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 年第 4 期。

③ 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16、18 页。

④ 陈庆德:《民族经济学构建的历史使命》,《云南社会科学》1994 年第 3 期。

族经济学研究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与其把某些学科推崇为某一学科的理论根源,不如将其关系淡化为相关学科。学科之间理论的相关性是普遍存在的,理论之间往往互相诱导、渗透,促进新的综合”。^①关于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的关系,有研究认为“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尽管在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有某些重叠和交叉,但彼此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其共同之处。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要发挥的作用相距甚远,研究方法也迥然不同。因此,它们彼此在完成各自承担的任务方面具有不可相互替代性。然而,民族经济学作为形成完善过程中的新兴社会科学学科,是完全可以经济人类学中汲取有益的营养的”。^②

施正一主编的《民族经济学教程》按照“广义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系统构建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体系,同时作为研究生教材,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从广义民族经济学视角构建的学科理论体系,不仅探讨了民族与经济的关系,中国民族经济的各个方面,还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及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第一次使‘民族经济学’的学科称谓与其研究内容真正相符。可以说,该著作的出版是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③王文长认为,“民族经济学对经济学与民族学的综合,表现为经济学研究指向的具体化和民族学研究内容的纵深化,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是一个呈现出鲜明民族个性的经济理论体系。民族经济学研究一般经济规律与自身特殊规律共同作用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形式,研究民族利益的实现方式、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认识论方法、基本论证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④他的观点是对民族经济学研究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明确了民族经济学与经济学和民族学的关系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

三、2000年到2012年:民族经济学研究快速发展阶段

1999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西部大开发列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并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思路 and 战略重点,2000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地区成为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为民族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民族经济研究也随之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注。除了之前从事民族经济研究的机构和人员外,越来越多的中央和地方研究机构、高校研究西部和民族地区经济问题,从事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经济研究的队伍壮大,研究成果激增,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人才培养规模和层次提高,研究队伍更加年轻化和高学历化。2000年以后的民族经济学研究不仅成果数量多,而且研究的领域和内容十分广泛,除了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外,研究成果最多的依次是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财政与金融、人口经济与就业、产业发展、扶贫开发、城镇化与工业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围绕西部大开发战略、新农村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兴边富民”行动、“对口支援”等国家战略和政策展开研究。

发展战略研究方面,民族经济学研究在继续“差距”和“加速”发展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发展理论和思想全面研究发展问题,如“和合加速”“包容性发展”“以人为本”和“内生发

① ④ 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王燕祥:《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③ 龙远蔚:《民族经济研究30年概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展”等发展理念的引入和阐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民族经济发展理论。也有一些学者运用“后发优势”和“跨越式”发展理论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展开研究。^① 2000 年以后,民族经济研究者深入民族地区城市乡村,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出版了一批数据翔实、资料丰富、内容全面的研究报告和经济调查丛书。具有代表性的有陈达云、郑长德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刘永佶、李克强主编的《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云南大学组织编写的“少数民族村寨调查系列丛书”,中央民族大学组织编写的“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丛书”等。

在产业经济研究方面,既包括三次产业发展、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整体性研究,^②还有对特色农牧业、旅游业、文化产业、民族医药业等的研究,在对这些产业发展基础、优势、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③ 草原畜牧业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区域特点,相关研究也十分丰富,主要涉及草原畜牧业的特点、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畜牧业产业化、草场制度变迁等。^④ 对民族地区财政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转移支付与税收优惠、金融市场的培育、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农村金融、特定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支持、金融发展权的保障、金融监管以及金融反贫困等方面。^⑤ 这些研究大多从民族地区财政金融发展的特殊性和需求的特殊性出发,提出相关对策建议。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成果最多的,研究内容包括民族经济心理、民族文化与经济互动、民族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民族经济行为的文化解释、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保护、农牧区经济制度变迁与文化适应等。^⑥ 民族经济政策与民族经济法制的研究渐成体系,通过对民族经济政策的系统梳理,分析民族经济政策的变迁、成就、实践中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思路。^⑦ 民族经济法制是之前研究的薄弱环节,2000 年以后得到明显增强,针对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生态保护、扶贫开发、城镇化等提出具体法制保障措施,丰富了学科研究内容。^⑧

随着民族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的增加,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受到重视,相关研

① 参见温军:《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曹征海:《和合加速论:当代民族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包容性发展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6 期。

② 参见谢丽霜:《产业梯度转移滞缓原因及西部对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高新才、滕堂伟:《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其产业经济分析》,《民族研究》2006 年第 1 期。

③ 参见林江:《民族经济学视野下的传统医药产业》,《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沈道权:《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论》,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张海燕、王忠云:《产业融合视角下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建设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4 期。

④ 参见包玉山、周瑞:《内蒙古草原牧区人地矛盾的加剧及缓解对策》,《内蒙古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邓艾等:《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产业发展思路与对策》,《开发研究》2003 年第 4 期;陈秋红:《草原生态敏感地区牧户畜牧业生产经营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0 年第 11 期。

⑤ 参见张跃平等:《金融支持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谢丽霜:《民族地区农村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张家寿:《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李俊杰、陈莉:《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调整方向和建议》,《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⑥ 参见吕俊彪:《民族经济发展中的文化调适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张锦鹏、苏常青:《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约束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黄绍文等:《农村体制变迁对哈尼梯田及生态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

⑦ 参见张冬梅:《中国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演变与调整》,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温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贵州民族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⑧ 参见宋才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法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宋才发主持的国家“十五”建设重点项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法律保障研究”,先后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

究成果增加,在民族经济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内容等问题的讨论中,一批新的成果出现。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核心概念、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展开讨论,同时指出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提出完善学科建设的思路。较有代表性如李忠斌的《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文长的《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叶坦的《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邓艾、李辉的《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刘永信的《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包玉山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核心概念、概念体系及理论意义》(《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这些文章从民族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逻辑起点、核心概念、研究内容、研究范式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和思路,对学科理论体系的深化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几部以“民族经济学”命名或相关的教材和专著,包括李忠斌的《民族经济发展新论》(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龙远蔚等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王文长的《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刘永信主编的《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等。

在这一时期,学者们继续关注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邓艾、李辉认为,“民族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整体研究思路从民族学范式向经济学范式转变,民族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应当是经济学框架内的结合”,“综合研究是新的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最显著的特点:一是以经济学研究为主,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二是把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均纳入统一的经济理论框架进行多因素综合分析;三是兼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三大目标的综合发展观”。^①王建红通过对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回顾认为,“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困境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其没有自己的研究范式,没有鲜明而得到认同的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因此,发展民族经济学的根本途径在于,加强对其逻辑起点和核心概念的探索,进而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②虽然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形成学科共同体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但大都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主要是民族学的研究范式,是不符合学科研究的事实。从最初乃至今天民族经济学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成果来看,不难发现研究范式的主流仍是经济学,大部分研究者具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相关学科的背景。在这个问题上,陈庆德等的观点更接近实际:“1978年—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集中于以经济学视角关注西部及民族地区发展,主要是由一些经济学者完成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民族经济研究进入了一个多学科加盟,多元化的研究视野的新时期。”^③他同时指出“作为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民族学的基本理论”。^④同时他主张“民族经济的研究,需要从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和生态维度来展开”。“在实践性上,民族经济是一个要求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相互交叉融合才能得以共同解决的论题;在理论性上,它是经济人类学乃至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内容的深化和

① 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② 王建红:《对民族经济学研究“冷”与“热”的思考》,《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③ 陈庆德、潘春梅:《民族经济研究的理论溯源》,《民族研究》2009年第5期。
④ 陈庆德:《民族经济研究的学科体系问题》,《民族研究》2010年第5期。

研究领域的拓展”。^①包玉山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分别围绕“少数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提出了相应的概念体系,使研究的指向性更加明确。^②作者的可贵之处是对民族经济学的概念范畴进行了凝练和规定,是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积极探索。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年,《民族研究》编辑部还组织刊发了相关的讨论文章,学者们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③

民族经济学创建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决定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研究从区域和民族的特殊性出发,更多地关注发展问题,在研究特殊性时也关照了“非经济因素”等对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对经济过程的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研究不够,2000 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加强。叶坦认为,民族经济研究的独特之处和价值就在于关注经济过程的文化因素,民族经济学并非经济学和民族学的简单“交叉”或“糅合”,而是在更高层面的整合、创新与生成;同时这还关涉另一个方面,就是文化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可能更恰当)。因而在民族问题上,经济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④王文长认为:“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构成民族概念的内在规定,并呈现为民族经济生活自然差异和文化差异二重性。把握民族经济生活差异二重性是构建学科理论框架的关键。”^⑤他以自然环境和文化差异的“二重性”为起点构建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体系,具有较严密的逻辑自洽性。

2000 年以后,经济人类学研究成果大幅度增加,以陈庆德和施琳为代表的学者在介绍引进西方经济人类学的同时,积极探索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在施琳看来,“西方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都是人类学(民族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不难理解,二者会有一些相似与区别之处,二者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理论源流与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根本性的指导思想、研究目的、研究侧重点与服务对象方面均有很大差异”。^⑥

从研究队伍看,这一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出生的研究者成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骨干和主体,可以称之为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代”,甚至还有更年轻的“新生代”,主要集中在民族院校或民族地区高校。现在全国有 28 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具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有 8 所学校具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还有一些学校在二级学科民族学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些学位点绝大部分是在 2000 年以后开始招生的,人才培养规模也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每年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数百人,而且从培养目标和方向看具有明显的区域和民族特点,体现了培养单位的学科优势和特点。同时,一些非民族地区院校的相关专业也更多地关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区域经济

① 陈庆德、潘春梅:《民族经济研究的理论溯源》,《民族研究》2009 年第 5 期。

② 参见包玉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核心概念、概念体系及理论意义》,《民族研究》2010 年第 5 期。

③ 参见陈庆德:《民族经济研究的学科体系问题》,《民族研究》2010 年第 5 期;龙远蔚:《关于少数民族经济概念的讨论》,《民族研究》2010 年第 5 期;庄万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建设再思考》,《民族研究》2010 年第 5 期;乌日:《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概念关系》,《民族研究》2010 年第 5 期。

④ 参见叶坦:《全球化、民族性与新的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民族研究》2005 年第 4 期。

⑤ 王文长:《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民族研究》2005 年第 4 期。

⑥ 施琳:《论中国民族经济学之路——发展轨迹与理论创新》,《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 年第 1 期。

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

四、2012年以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新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方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对于民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新时代加强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新理念和新思路。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将“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基础设施、扶贫开发、城镇化和生态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释放民族地区发展潜力、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生态文明建设等也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民族地区如何通过“精准扶贫”实现“整体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的历史机遇，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这一时期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民族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发展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2014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指出：“增强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①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习近平提出民族地区必须实现跨越式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要促进各民族跨区域流动。在学者们梳理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有关民族经济工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各民族要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建设目标，“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掉队”；二是对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出“五个并存”的判断中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水平低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将历史上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地区托举到新一轮开放发展的前沿和中心地带，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成为支撑和拓展国家发展的新空间，成为最有活力、最有后发优势的地区。^②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这种“重要财富”和“重要优势”不仅体现在资源富集、水系源头、生态屏障、文化特色的优势方面，也反映了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民族工作现实的“短板”，立足于这样一个“家底”，边疆建设、兴边富民、“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脱贫攻坚，就成为国家建设、中华民族建设现实而紧迫的任务。^③

“一带一路”倡议使民族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成为前沿，有学者研究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契合性，表现为战略方针政策契合民族地区外向经济发展，共同地缘特征降低民族地区边境通道经济成本，双向要素流动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低端经济范

① 《习近平的民族观》，新华网，2015年8月24日。

② 参见乌小花、郝因：《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解读》，《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③ 参见郝时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民族工作》，《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式倒逼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文化心理认同拉动民族地区贸易经济大繁荣。^① 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和重要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将使西部地区形成新的对外开放前沿与经济增长极,为主要位于西部的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② 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经贸产业合作跨国大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也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发展及反贫困战略的实施;^③ 民族地区内陆沿边口岸经济受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最大。^④ 还有学者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六大经济走廊与相关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人口集聚与产业布局相协调的产城(镇)融合模式。^⑤

民族地区是精准扶贫的主战场,精准扶贫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地区考察时提出的,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是全国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是精准扶贫思路的科学概括。^⑥ 学者们在分析民族地区贫困现状、原因的基础上,围绕精准扶贫的最新进展、政策实施效果,对不同地区深度贫困的根源进行了分析。^⑦ 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多维贫困存在地区和民族差异,西南三省区较西北四省区更严峻,少数民族多维贫困较汉族严峻,因此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需要从多维视角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地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精准施策。^⑧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无法依托既往同质化的经济增长手段应对差异化的减贫事实,扶贫政策的设定应体现因地施策。^⑨ “三区三州”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深度贫困地区,对扶贫政策有高度依赖性,有学者用新经济地理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分析“三区三州”贫困的特殊性,发现通过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可实现减贫与可持续发展;^⑩ 也有观点认为“三区三州”减贫脱贫必须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专项扶贫规划、提升扶贫政策的效应,充分发挥宗教文化在扶贫中的“正能量”,加大内生动力培育。^⑪ 关于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模式与机制,学者提出通过制度安排来使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形成合力,产生 1+1>2 的协同效应。^⑫ 有研究基于实地调查阐述了精准脱贫退出机制的实施、效果评价和存在问题,提出了进一步量化和细化贫困退出标准、以贫困脆弱性进行非贫困人群的区分有效降低返贫概率、动态调整相关扶贫政策、鼓励贫困家庭树立自觉脱贫志向、加大收入动态调整力度等对策建议。^⑬ 除了上述研究外,还有大量有关具体区域和民族的精准扶贫、民族地区产业和金融精准扶贫的研究。

① 参见章文光、田茂运:《“一带一路”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契合性分析》,《新视野》2017年第1期。

② 参见郑长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2015)——“一带一路”与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

③ 参见张磊:《“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④ 参见涂裕春、刘彤:《民族地区口岸经济发展预判——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分区域类型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⑤ 参见张永岳、张传勇、胡金星:《“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⑥ 参见沈万根、马冀群:《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实践》,《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

⑦ 参见张丽君、吴本建、王润球:《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6》,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年版。

⑧ 参见刘小珉:《多维贫困视角下的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基于CHES2011数据的分析》,《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⑨ 参见郑长德、单德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时空演进》,《南开学报》2016年第3期。

⑩ 参见郑长德:《“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奔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民族学刊》2017年第6期。

⑪ 参见李俊杰、耿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以“三区三州”为例》,《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⑫ 参见李忠斌:《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村寨模式”研究——基于10个特色村寨的调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⑬ 参见丁赛、李文庆、李霞:《民族地区精准脱贫退出机制的实施效果及问题——以宁夏永宁县闽宁镇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民族地区作为生态脆弱区,在新常态背景下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美丽中国”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学者们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关系、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区域和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和谐共生、持续发展、整体协调的内涵,以及协调性、系统性、战略性的特点;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包括强化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生态保护的法制和机制,激发民间生态思想和环保力量,创新产能方式提高生态效率。^①还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具有契合性,民族地区低碳发展要发挥民族生态文化的功能,^②将公共价值理论应用于生态建设项目评价,构造生态建设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③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已上升至国家层面。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现状、问题及路径模式三个方面。研究者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当前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城镇化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④一些学者在分析民族地区城镇化困境和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模式和路径,如“扩边进城、小镇吸附、乡城互动、城乡一体、城城过渡及村镇互促”等;^⑤基于区域特色总结了特定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模式,如环青海湖“候鸟型生态城镇化”模式、^⑥临夏回族自治州基于“五位一体”的城镇化模式。^⑦

特色村寨建设是一个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2009年国家民委启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并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建成1000个特色村寨的总体目标。相关研究一方面在总结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内涵的基础上,对特色村寨建设实施过程阶段和建设完成阶段进行指标设计,从而准确识别实际建设状况与预期目标的偏差,制定合理的纠偏策略,以达成建设目标。^⑧另一方面,针对特色村寨建设中的利益失衡状态,提出了基于参与一分享机制的特色村寨建设社区利益平衡的若干主张和对策建议。^⑨同时,还关注到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的文化保护与发展问题、^⑩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载体的精准脱贫研究、^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与民族旅游融合发展研究等领域。^⑫2017年中

① 参见杨旭、金炳镐、盖守丽:《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在民族地区的实践路径》,《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4期。

② 参见张春敏、梁茜:《民族生态文化与民族地区低碳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③ 参见樊胜岳、聂莹、郑秋亚:《我国民族地区生态建设项目的公共价值绩效评价——以内蒙古奈曼旗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④ 参见张永岳、张传勇、胡金星:《“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吴开松、张雄:《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6期。

⑤ 参见李忠斌、郑甘甜:《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模式选择》,《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

⑥ 参见丁生喜、王晓鹏:《环青海湖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开发战略研究》,《兰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⑦ 参见王平:《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与模式探究——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为个案》,《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⑧ 参见李杰、苏丹丹、李忠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过程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

⑨ 参见文晓国、李忠斌、李军:《论特色村寨建设中社区居民利益保障机制及实现方式》,《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5期。

⑩ 参见李忠斌、郑甘甜:《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的文化保护与发展》,《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⑪ 参见李忠斌:《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村寨模式研究”——基于10个特色村寨的调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⑫ 参见李忠斌、刘阿丽:《武陵山区特色村寨建设与民宿旅游融合发展路径选择——基于利川市的调研》,《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学者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村落的产业发展,旅游可持续扶贫等进行了研究。^①

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学者继续围绕学科定位、理论体系、学科归属等问题展开讨论,认为“民族经济学在学科理论发展特别是学科归属方面存在分歧,尚缺系统、完整、稳定成熟的学科组织结构”;^②“调研基地建设力度不够,已建立民族经济学科的高校缺乏沟通”,^③这也导致了在人才培养上,“研究生的专业培养缺乏规范和标准评判,与成熟的经济学科相比较还存在明显差距”。^④

在提出上述问题和学科发展趋势的同时,也有学者就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的关系、“一带一路”与民族经济学理论创新进行了积极的思考。罗康隆、田广认为,“经济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过程,严格地说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正式开始的,西部开发研究以及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创立,就是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标志”。并指出民族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两门学科在我国学术界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重叠部分越来越多,而研究方法也有趋同现象”,认为“两者的联合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并由此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以民族经济学为基础,而且只有以民族经济学为基础,才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⑤ 在这里,两位学者提出了经济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但就现有的研究而言,不能说民族经济学是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正如前文王燕祥和施琳关于民族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关系中所说,两者有联系,但区别也很明显,在以后的研究中会相互借鉴,但不会相互替代。李曦辉认为,“民族经济学就是对民族过程的政治文化效果进行经济学分析,按照经济学而非民族学的范式进行规范研究的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为民族过程,包括民族分离、民族融合、民族相容和民族认同等,并探寻这一过程的经济学价值。它的研究范围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民族,而非仅仅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其中特别关注民族过程所特有的非经济因素对自由市场规模与范围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如何在民族过程中在优化生产要素流动的基础上改善自身绩效。研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区别于以往所有学科的全新经济学科,从经济学视角观察民族过程,为该过程提供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反过来也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入民族因素,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新的理论支撑维度”。^⑥ 他提出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创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思路,但就学科体系建设而言,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这一时期有关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著作,除了修订出版的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教程》(第三次修订版,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第三次修订版,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年版),施正一主编的《民族经济学教程》(第二次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外,还有庄万禄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论纲》(民族出版社 2013 版)和朱宏伟编著的《民族经济研究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随着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完善

① 参见汪姣:《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扶贫研究》,《农业经济》2018 年第 8 期;许少辉,董丽萍:《论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村落的产业发展》,《民族论坛》2018 年第 2 期。

② 张丽君、杨秀明:《基于学科发展史视角的“民族经济学”学科评述与展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 年第 4 期。

③ 李忠斌:《论特色与优势学科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以民族经济学为例》,《科技创业月刊》2015 年第 23 期。

④ 王孔敬:《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硕士点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6 年第 11 期。

⑤ 罗康隆、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

⑥ 李曦辉:《全球化中国版之“一带一路”支撑理论研究——兼论民族经济学的时代价值》,《区域经济评论》2017 年第 6 期。

和教学需要,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史的研究增加,丰富了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较有代表性的如杨思远主编的《蒙古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黄健英编著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和《民族经济学4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年版)。

五、结 语

回顾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民族经济学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快速成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体系、研究队伍,是由中国人提出并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学科,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民族经济学研究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出发,注重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公平和协调发展的研究。民族经济学创建以来,从民族地区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结合民族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等影响和决定的发展环境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地提出符合其经济发展特点的理论和主张。在研究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研究各民族、各地区共同发展、团结互助、共享经济发展利益的机制和路径,把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文化发展相结合,注重区域、民族间的协调发展。学科产生的背景和性质决定了民族经济学具有显著的问题取向,从研究成果看,大部分为应用性研究。相对于丰富的应用研究,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在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核心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理论体系等方面存在分歧,今后需要在丰富的应用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凝练学科概念、深化研究内容、完善理论体系。从研究范式看,除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经济学规范研究(也有学者认为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为主的研究传统外,2000年以后实证研究明显增加,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多个专题做了大量实证研究,使民族经济学研究具有了更明显的经济学范式特点。除了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外,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研究生培养体系内,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一些单位,以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为主,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为民族经济学研究提出新的要求,也使民族经济学理论创新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在继续关注和研究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问题的基础上,民族经济学研究急需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基本矛盾变化的特点、表现形式、变化趋势的研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理论和对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自然也要“一个都不能少”地共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因此,现代化研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同样居于重要地位。民族经济学要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根据国家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总体布局,结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研究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现代化模式和路径,丰富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 马 骅〕